

# 以馬印新成長三角論新加坡次區域發展策略

謝佳呈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生)

## 摘 要

成長三角是一個相當獨特的亞洲國家經貿發展模式。新加坡提議共組馬印新成長三角，自然是基於經濟全球化及區域化下的本身利益以及因應亞洲的政經局勢發展而做出的考量；馬來西亞則著眼於南北發展均衡以及在東南亞的政經角色，而印尼就希望藉由工業區的成立而繁榮當地經濟。一般而言，新加坡是處於包含多元文化以及複雜政經環境的東南亞地區，因此新加坡勢必與鄰近國家互利共榮，方可保有國家發展的利基。

**關鍵字：**馬印新成長三角、次區域合作發展、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

## 壹、前言

世界經濟的風潮從全球化到區域化，各國間的政經發展程度不一，這些情況在亞洲地區亦可發現到，雖然亞洲的整體經濟前景是被看好的，但是在面對歐洲及美洲的這兩大區塊經濟體(bloc economy)，亦即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洲至今尚沒有成立一個具有良好運作的區域經貿性組織來促進亞洲經濟發展。亞洲地區包含經濟發展程度不一的國家，而不同型態政體的國家也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的整體經濟方針。從國家的角度而言，國家發展不僅要檢視本身的政經結構，同時也要端視週邊政經環境與本身的相互關係。新加坡是一個位居多元文化及複雜政經的東南亞區域內，而她是一個重度依賴貿易的城市國家

(city-state)，所以，新加坡在放眼國際時，也不敢忽視與週邊國家的政經關係。新加坡從英國殖民初期的小漁港逐漸演變成至今的全球重要的商業轉口貿易港，除了若干的地理及歷史因素外，新加坡的發展相較於馬來西亞的柔佛州以及印尼的廖內省而言是較為繁榮的，而這樣的邊境整合(borderland integration) 經濟發展也帶動了分別位於馬來西亞及印尼邊界的柔佛與廖內之經濟發展。<sup>1</sup>漸漸地，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成長區域儼然成形，這一成長區域也就是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基本範圍。

產業生產全球化的概念讓企業會將工廠從生產成本高的地方移至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這樣的趨勢也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起飛和轉型的一大主因。身為四小龍中的一員的新加坡運用本身、柔佛州及廖內省各有要素稟賦的不同，以馬印新成長三角的角度來看，這三地要素的結合對於馬印新成長三角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因為可以吸引外資以及增加貿易。而新加坡力維此成長三角的發展也是需要透過經濟上至政治上的擴溢效應方能為本身帶來政經效益。

次區域發展對於整體的亞洲經濟發展而言，雖然不是主要的發展趨勢，但是這對於亞洲地區各個經濟體，不管是幅員廣闊或政經潛力相當的資源市場大國(例如，中國大陸、俄羅斯)或是經濟發展程度相對高的經貿國家(例如，新加坡、南韓)，共組次區域經濟圈是奠定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石之一；就整個亞洲經濟發展的重心，亦即發展最繁榮的東亞地區來看，亞洲經濟是由數個次區域經濟圈(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所組成的，雖然這些次區域經濟圈還在發展當中，但是至目前為止，這些次區域經濟圈均具有永續發展的能力以及經濟規模，這些也是形成亞洲經濟發展的主要拼圖。<sup>2</sup> (參見圖一)

---

<sup>1</sup> Minghi, J. V., "From conflict to harmony in border landscapes," in D. Rumley & J. V. Mingley, eds., *The geography of border landscapes*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15-26.

<sup>2</sup> Dajin Peng,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7, No.4, Winter, 2002/2003, pp.613-641.

圖一【東亞次區域經濟圈】



資料來源：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頁 612。

明顯地，新加坡的次區域發展策略是希望能透過所在之次區域經濟圈的發展來為本身的亞洲政經位置加分以及為本身的國家發展增加基礎能量。本文從馬印新成長三角的介紹為起點，並嘗試從中透過相關理論來觀察此次區域經濟圈，最後描繪出馬印新成長三角這種次區域發展對於新加坡的影響。

## 貳、成長三角的觀察途徑

成長三角是一個以貿易出口為導向的次區域經濟圈並且需要外來投資的挹注，因此，成長三角可視為一個貿易投資的經濟圈；它不僅增加區域內及對外的貿易量，同時也吸引投資進來充實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sup>3</sup>基於此，成長三角的觀察面向或途徑可先從成長三角的基本特色為起源，接著以雁行理論來描述成長

<sup>3</sup> Fu-Kuo Li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etus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Pacific Asia," in Ian G. Cook & Marcus A. Doel & Rex Li, eds., *Fragmented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in Pacific Asia* (Brookfield: Ashgate Publishing, 1996), pp. 153-154.

三角自成的生產鏈以及就擴溢效應來觀察成長三角的政經事務。

## 一、成長三角的特性

一般而言，次區域經濟區、自然經濟領域(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y) 以及擴展的都會區(extend metropolitan region) 的含意與所謂的成長三角是相同的；而這些辭彙均意指跨越那些彼此疆界具鮮明界定的並且牽涉到數個國家的鄰近地區，而這些地區具有可用來促進對外貿易和投資之各自不同的要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sup>4</sup>從上述的說明中，成長三角係一個橫跨至少三個以上的國家或國家的部分地區之次區域，並且這個次區域的經濟合作利用所包含之地方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 來吸引多國籍企業在次區域中投資、生產，進而增加整體的對外貿易量。

由馬印新成長三角中可以歸納出四個特性，分別是經濟互補(economic complementarity)、地理相鄰(geographical proximity)、政策調和(policy coordination) 以及基礎建設發展良好(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sup>5</sup>

經濟互補：馬印新成長三角中的新加坡、柔佛州及廖內省基於要素稟賦而各有本身的比較優勢；而比較優勢則是源自於要素稟賦的不同。就像是，新加坡具有良好的管理以及專業人才、發達的交通運輸體系和電訊傳播網等發展良好的軟硬資源可吸引外資及外商以蓬勃成長三角的經濟；而相對地，新加坡自然得讓那些具勞力密集和土地密集的產業移至柔佛州或是廖內省。因此，這三者的經濟互補可使馬印新成長三角更具有吸引力以吸引投資者進駐本區從事商業活動。

地理相鄰：成長三角的重要基本範圍是地理上的相近性，新加坡至柔佛州或廖內省的巴譚島只需一小時以內即可，對於在此投資的廠商不需千里迢迢地到達生產地或是經銷地，這對於經營者是較有幫助的，亦即地理相鄰減少了交通運輸的成本、方便控管生產的流程進度以及快速運送中間財貨和最終財貨；但是，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地理相近性的優點主要是建基在本區的文化、風俗及語言的互容程度不低，新加坡是個移民國家，雖然華族佔總人口數的七成五左右，其他的人口則是包含馬來族、印族及歐美人士，但這種由多元種族組成的移民社會的特點是新加坡政治和政策的立足點之一。<sup>6</sup>因此，新加坡在語言、風俗及文化上均能與柔佛州及廖內省的馬族和印族互容，這對於投資者而言，可以大大減輕因語言文化價值觀而產生不利商業經營的環境之潛在風險，而華族長年在馬來西亞及印尼經商所累積的網絡也是活絡馬印新成長三角經濟的間接因素之一。基於安全的因素，新加坡也必須務求週邊地區的穩定，這樣才能給與本身國家安全及經濟安

<sup>4</sup> Min Tang and Myo Thant, "Growth Triangl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Operational Problem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February, 1994), p. 1.

<sup>5</sup> G. Naidu, "Johor-Singapore-Riau Growth Triangl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Myo Thant & Min Tang & Hiroshi Kakazu, eds., *Growth Triangles in Asia: A New Approach to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4-240.

<sup>6</sup> 柯新治,《新新加坡：南海之珠的經濟與社會新動向》(台北：天下遠見，2003年)，頁229。

全的基本保障。所以，地理相鄰是成長三角的必備要件。

政策調和：當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時，國家對此的態度不能模擬兩可，在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形成過程中，雖然是由新加坡發起的，但經過當時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迪(Mohamad Mahathir) 及印尼的總統蘇哈托(Mohamed Suharto) 所執政的政府當局認可後，三方在政策的調和度上日漸趨於接軌，就投資自由化而言，馬來西亞在 1980 年代中更積極地進行政策改革，而印尼也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著手投資政策的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也使得三方的經貿投資以及人貨往來的程序更加順暢，整合程度也相對增加，基於彼此間合作的順暢度及整合度提高，自然是吸引外資的重要要件。

基礎建設發展：新加坡具有陸海空三面向的良好基礎建設，使得新加坡港成爲世界上相當繁忙的港口，再者，不管是民生用或是工商業所需的基礎設施之供應均完善且齊全，這些是經濟發展重要的基石，相較之下，雖然柔佛的基礎建設的完善程度不似新加坡，但是在馬來西亞政府當局的建設下以及爲配合馬印新成長三角的發展，柔佛州的基礎建設程度比廖內省的較好。

基於馬印新成長三角的色個特性，其中的經濟互補造就此次區域經濟圈吸引外資及增加貿易，而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新加坡是一知識經濟體並且擁有相當多的企業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sup>7</sup>因此新加坡藉由產業升級而投資次區域內的柔佛與廖內，這也帶動這兩個地區的繁榮，就此而言，新加坡彷彿是領頭雁而帶領柔佛與廖內邁向經濟持續發展之路。再者，其中的政策調和可表示，三方藉由經濟合作的方式來以收綜效，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形成由最先的單存的經濟事務的合作及整合以創造規模經濟的利益，但爲求次區域經濟合作的運作良好，政治事務的調和也是隨之而來的要件，因此，這類的擴溢效應不僅讓三方的經濟有所成長，也讓三方彼此在政治事務上能朝向調和的境界前進，三方之間的政經關係也會相對地穩固。

## 二、雁行理論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Akamatsu Kaname)於 1930 年代提出雁行理論(flying-geese theory)，他以日本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的工業化經驗爲理論基礎。根據日本紡織業(織品與紡織機) 與機械工業的統計數字，說明雁行理論的模式、過程與結構，希望利用這個模型以解釋日本與開發中國家工業化與經濟成長的模式。<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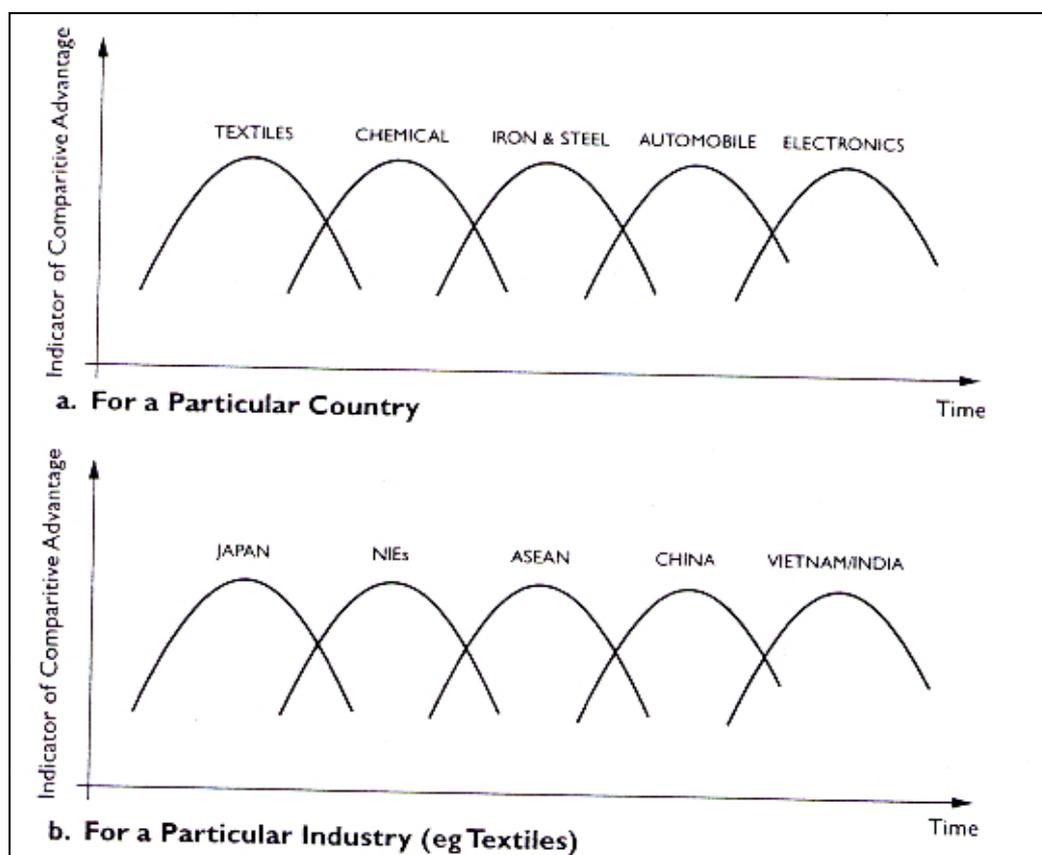
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是一個廣泛用來描述亞洲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模式的風潮且自 1960 年代從日本吹經新興工業國家而至東協

<sup>7</sup> Chia Siow Yue & Jamus Jerome Lim, "Singapore: A Regional Hub in ICT," in Seiichi Masuyama & Donna Vandenbrink, eds.,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ast asia's changing industrial geography* (Singapore: ISEAS and NRI, 2003), pp. 259-273.

<sup>8</sup>王佳煌，《國家發展》〈台北：台灣書店，1998年〉，頁182。

國家的過程；而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地理相鄰以及經濟互補的條件卻實是亞洲雁行式工業化模式驅動的主要基礎。除此之外，雁行理論的模型也可解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業生命週期，這週期可分為發展期、進口替代期、出口期、成熟期和反向進口期；具體而言，就像紡織(textile production) 業從日本移至新興工業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 而後至東協國家及中國大陸，這也就是勞力及土地密集產業將逐漸移轉至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地方，如同新加坡的傳統製造業逐步地遷移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廖內省。在這個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投資與貿易佔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就投資國(investing countries) 而言，通常是經濟發展較高的國家，衰退產業的移出將釋出勞工及資金等資源給新興產業，可能進而使這些明星產業升級未來整個的產業結構，而對接受國(receiving countries) 來說，通常是經濟發展較低的國家，外資的引入將有助於資金的吸納、管理技術和科技的取得，這些對於接受國來說是邁向工業化所必需的基礎條件。對產業或是國家而言，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發展的利基，當一個產業或國家擁有某一比較優勢，則其前景是可期的，同時，這也是替產業或國家累積發展或升級的能量的本錢。(參見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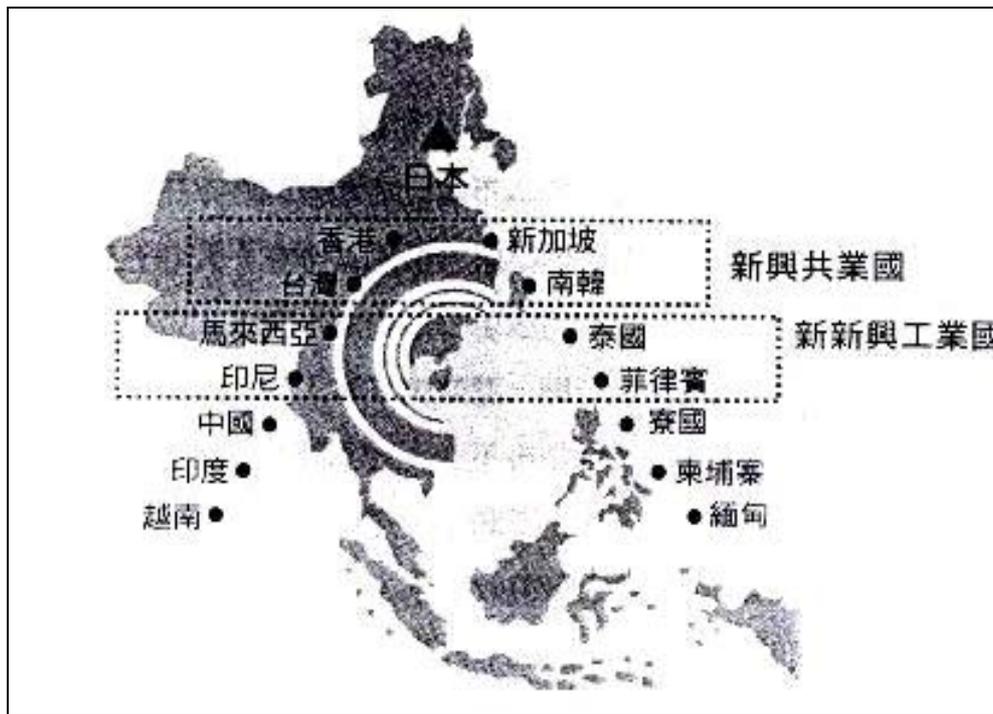
圖二【雁行模式的比較優勢之移動】



資料來源：Asia's Borderless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Zones, 頁 6。

當一個產業發展到成熟之後，開始要下滑時，下一個產業也就是成長之時；如同當某一個產業在一個國家發展到要走下坡時，自然必須移轉到別個國家來繼續產出。就此，亞洲國家發展經濟的梯隊排列有如雁鳥在結隊飛行時所呈現「V」字型且由一隻帶頭朝向氣候適宜的境界。<sup>9</sup>（參見圖三）

圖三【雁行排列】



資料來源：亞洲新未來 — 建立永續發展的經濟體，頁 32。

因此，綜上所說，雁行理論的三大主要條件為：地理上的相近、經濟發展的不一以及有利於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開放經濟體系。<sup>10</sup>而這三的要件也是有利於成長三角的發展。

<sup>9</sup> Philip Kotler 和 Hermawan Kartajaya 著，劉世平 譯，《亞洲新未來：建立永續發展的經濟體》(Repositioning Asia: From Bubble to Sustainable Economy) (台北市：商周出版，2001 年)，頁 32-33。

<sup>10</sup>發展期(introduction stage)意指國內的某些產業需依賴模仿及技術轉移的方式並且國內的市場是不成熟的狀態急需依賴進口。進口替代期(import-substitution stage)意指國內產業產出成長快速且進口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出口期(export stage)意指當國內產出呈現供過於求時則開始將超出的部分外銷出去。成熟期(mature stage)意指產出和出口的呈現下減少因為生產成本的漸增和對未開發國家的投資增加。反向進口期(reverse-import stage)則是指某些產業再次變成單存地進口因為這些產業只須從海外子公司進口成品而將主力放在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出上。參閱 Edward K. Y. Chen & C. H. Kwan,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in Asia," in Edward K. Y. Chen & C. H. Kwan, eds., *Asia's Borderless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Zone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7), pp. 2-7.

### 三、 擴溢效應

區域合作與區域整合式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發展趨勢之一，並且區域合作及整合可歸納為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等三大面向。擴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 的產生是源於區域內跨國界間的交流及互動。因此，不論「合作」或「整合」均是國家為共同利益而互相配合的共識方式，兩者主要的差別為決議方式與會員國的自主權。就決定權與決策效力而言，在「合作」的模式下，會員國仍保有絕對的自主權，凡任何共同決議需獲得各國一致同意方可，且不具絕對之約束力，各國主權仍高於共同決議之效力。而「整合」則意指一動態且有意識之過程，在此過程中，國家轉移部份的主權至一具有制定規則或決策的制度性機構，或由此常設機構代為決策，或由會員國以多數決方式決策，而決策結果對於所屬會員國具法律上與政治道德上的約束力。亦即，合作乃政府間的協調與聯繫行為。各國政府在合作的架構中，得以交換資訊、告知立場，建構一個國與國間的政策對話平台，據此進一步考量彼此政策協調之必要。為在此合作機制下，權利與義務的劃定是鬆散的，會員國間或許藉此得以建立起盟友或同一陣線的認同，同盟間的相互約制或許於無形間影響成員國對事務的認知與政策，然法律層面上並無實際約束效力。而整合則為一權力集中的過程，唯此權力集中過程裡，會員國所預期與實際上繳之權力或有不同或有階段性之區別。假若組織成員參與的制度架構對於會員國已具約束制裁能力，甚而具備超國家組織的雛型，並且逐步朝此目標發展，那麼即可視為是一種趨近整合的型態，相對之下，假若組織成員仍然是以國家角色出發，且不脫傳統國際政治的折衝、妥協、談判，運作機制仍屬政府間組織的型態，則應以合作視之。<sup>11</sup>而成長三角這種次區域經濟區並沒有發展成一個超國家組織的型態，所以，依上述所列，成長三角之間的交流互動是屬於合作的形式，而本文的擴溢效應也就是從此形式中衍生。

擴溢效應的論點源自於新功能主義，因為新功能主義並不認為功能合作的網狀擴張效果可以在無人操控的情況下自然發揮出來，而擴溢效應的提出為了說明網狀擴張在何種情形下方能成形。對於擴溢效應，新功能主義有兩項論述。其一，由於功能合作的擴散過程常與政治勢力的版圖相互抵觸，如何得到政治勢力的支持是擴散能否成功的關鍵。亦即，若政府或利益團體在合作過程中能得到資源與利益，並且願意將合作經驗擴大至其他領域，功能合作方能從一領域進入另一領域，這也就是擴溢效應的發揮成果。其二，在擴議的過程中，主事者與利益者將逐漸發現，一旦功能性合作逐步增加後，爭議性議題也會增多，在解決紛爭與分配的過程中的政治化成分也就愈高。除此之外，新功能主義亦認為，功能合作本身並不足以挑戰國家界線。<sup>12</sup>就成長三角而言，三方從原本基於經濟事務功能上

<sup>11</sup>辛翠玲、吳重禮，〈從合作到整合：論歐洲政治合作的發展〉，《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十卷第一期，2002年6月，頁25-51。

<sup>12</sup>辛翠玲、吳重禮，〈從合作到整合：論歐洲政治合作的發展〉，頁25-51。雖然新功能主義是源於功能主義，但是新功能主義的提出是對功能主義的修正。主要修正點在於，新功能主義認

的合作到政治事務功能方面的調和。在基礎建設發展以及政策調和的方面來看，三方的公部門與私部門爲了擴大經濟規模效益，不管在政策上的修改、政治氛圍的營造以及基礎建設發展上的合作均顯示出功能合作從一領域進入另一領域的現象。

從雁行理論的形成要件與比較優勢的觀點以及擴溢效應的合作功能領域跨越的觀點來看成長三角的特色，可以發現成長三角的經濟合作，除了發揮三方各自的經濟發展優勢之外，也兼具透過合作而得的擴溢效應，因而，次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能擴展經濟效益以及增加政治上的相互調和。

## 參、馬印新成長三角

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形成不僅代表著亞洲經濟發展中的一塊拼圖，也標誌著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透過這一次區域經濟合作方案而共同發展經濟以互利共存。接著就描述馬印新成長三角的發展、參與者對此合作方案的著眼點及相關資訊來評估此成長三角。

### 一、馬印新成長三角的發展

馬印新成長三角(Malaysia-Indone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由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三個國家共組，其中主要的含蓋範圍是：位於馬來半島(Malaya peninsula) 的南來西亞南部的柔佛州(Johor)、新加坡以及地處印尼北方的廖內群島(Riau islands) 的廖內省(Riau)。(參見圖四)

---

爲，雖然國際間某一個部門的功能合作或許得以擴散至其他部門，但在過程中，常會牽涉到傳統的國家主權、政治角力等問題，導致功能合作的網絡的擴張遇到障礙。關於新功能主義的相關論述，可以參閱 Hass, Ernst B.,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Hass, Ernst B.,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indberg, Leon N.,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Nye, Joseph S., Jr.,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s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entland, Charles,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Russett, Bruce,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7). 等學者著作。

圖四【馬印新成長三角】



資料來源：Triangulating the Borderless World: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頁 487。

馬印新成長三角扼麻六甲海峽(straits of Malacca) 與新加坡海峽(strait of Singapore)，歐洲與亞洲間重要且繁忙的水運路線，不僅經濟位置重要而且戰略位置也是重要，<sup>13</sup>而在這成長三角區域內，富含很多的資源，除了天然資源之外，也包括各種產業所需的人力、土地和相關基礎建設。從圖中顯示，柔佛、新加坡與廖內之間的距離不遠，讓企業能就近取得所需的資源，而這地利之便也是讓企業減少產銷成本的重要因素。

雖然馬印新成長三角於 1989 年 12 月由當時的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Goh

<sup>13</sup>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是東南亞國協(ASEAN)的會員國，同時也有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因此在東南亞經濟領域中是重要的一環，同時東南亞內的南海問題與國家間的疆界爭議，使得此成長三角的穩定發展對於周邊的經濟與安全產生一定的潛在作用。參閱 Donald E. Weatherbee, "Southeast Asia at Mid-Decade: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pp. 3-27.

Chok Tong) 正式提議，最後並於 1994 年 12 月由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三方正負簽署三國共同發展次區域成長三角的協定，<sup>14</sup>但是話說 1980 年代中期，新加坡爲了替本身在土地、勞工與供水方面長期依賴柔佛而找個替代方案，所以就漸漸地加重對印尼廖內等地的經貿投資。基於雅加達(Jakarta) 與新加坡雙方的關係日漸升溫以及新加坡在廖內省內成立工業園區及觀光休閒設施，新加坡爲避免引發柔佛方面對此有不必要的負面想法，因此，爲了緩和可能的反彈情緒及推廣、加深與雙邊的合作關係，結合三方合作的「成長三角」的想法就應運而生了。由實務面來說，「成長三角」的想法就是在區域下結合新加坡、柔佛及廖內的資源力量以幫助整體的發展。<sup>15</sup>

次區域經濟區的成形運轉需要外在及內在的雙重環境的配合。而就外在環境而言，有兩股力量型塑有利於成長三角出線的環境。一爲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區域合作提高而形成國家利益可透過區域發展型態來達成。這表示說，當內向(inward-looking) 以及零合(zero sum) 型態的合作方式由外向(outward-oriented) 以及競合型態的合作方式所取代時，雖然區域內的政治紛爭能無法得到化解，但是合作方式的改變確實爲區域內的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利益，而這也間接地緩和彼此間的政治緊張氣氛。再者，生產全球化、技術移轉與資金四處流動所營造而出的世界經濟是潛藏許多無可預測的發展，而且亞洲經濟也要面對具有保護主義色彩以及影響力日俱的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這類的貿易集團，亞洲的區域合作也就刺激了地方經濟的成長以及緩和外在世界發展的衝擊。二爲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量與質的變化，這類的外資(FDI) 也型塑亞洲經濟的發展。這表示說，自 1960 年代早期之後，投資的重點從單存地以獲取天然資源來換取出口的目的轉變至投資貨品製造來換取出口的目的。而這樣的投資轉變讓雁行效應發酵，這不僅是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循著日本的發展模式來進行產業發展與投資活動，也增加區域內貿易的蓬勃發展。這種投入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投資也就此造就具有經濟發展不一和要素稟賦重要的亞洲經濟體結構。<sup>16</sup>

就內在環境而言，經濟互補是促使三方合作的最終要的基本關鍵。馬印新成長三角並不是亞洲唯一的次區域經濟成長圈，所以，各個次區域經濟區彼此間仍是爲了吸引更多的經貿投資而存有相互競爭的煙硝味。因此，每個參與者的要素稟賦可用來評斷彼此間的經濟互補性。新加坡基本上擁有較好的投資環境與教育品質，並且政治社會方面穩定程度高，同時這個城市國家以經貿服務業爲主，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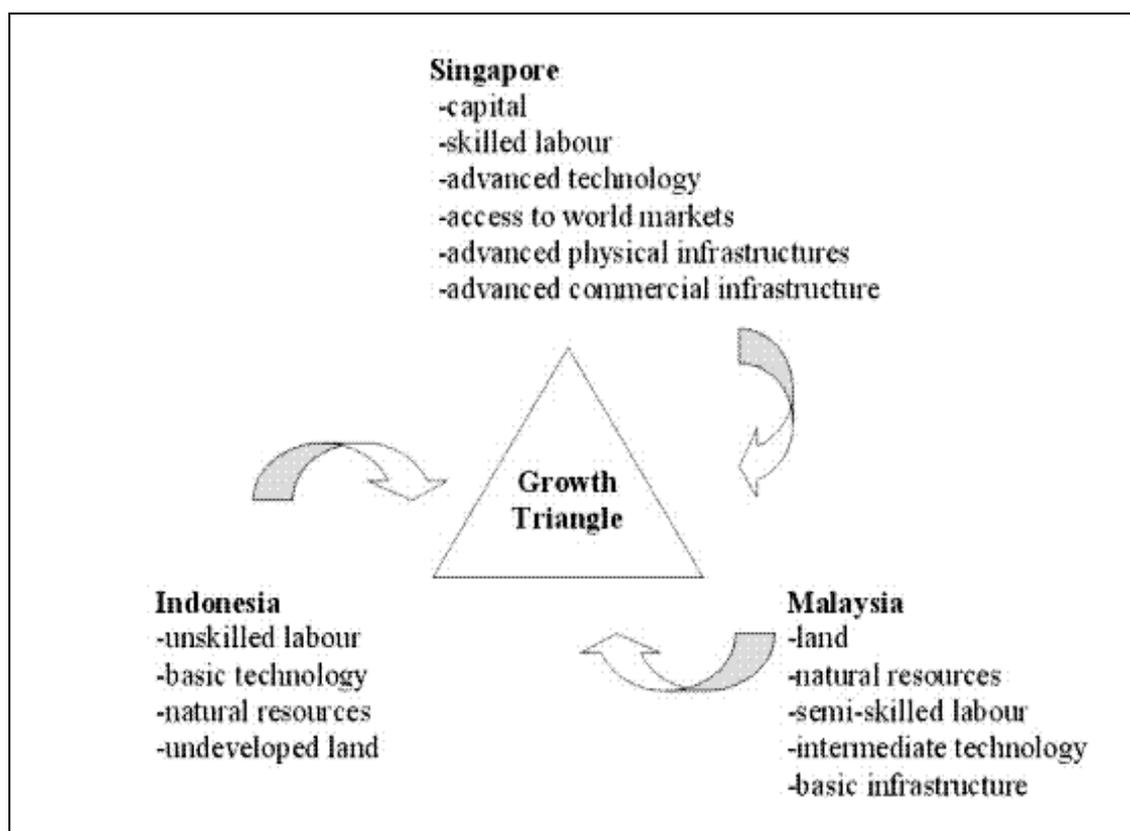
<sup>14</sup>吳榮義，〈亞洲次區域成長區雙贏的啓示——談台灣與沖繩經濟合作關係〉，《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1 卷第 3 期，1998 年 3 月，頁 104-110。

<sup>15</sup> Singapore-Johor(e)-Riau Growth Triangle(SIJORI)、Singapore-Malaysia-Indonesia Growth Triangle(SMIGT)以及 Malaysia-Indone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MISGT)均是指由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所共組的成長三角。參閱 Macleod, Scott & T.G. McGee., "The Singapore-Johor-Riau Growth Triangle: An Emerging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in Fu. Chen Lo & Yue-man Yeung, eds., *Emerging World Cities in Pacific Asi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17-464.

<sup>16</sup> Waldron, Darryl G., "Growth Triangles: A Strategic Assessment,"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5, No.1, Spring, 1997, pp.53-67.

濟發展程度較高且具有全球性的貿易港口。因此，新加坡的比較優勢為：資金(capital)、技術勞工(skilled labour)、高階技術(advanced technology)、全球市場管道(access to world markets)、完善的基礎建設(advance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s)和完善的商業基礎建設(advanced commercial infrastructure)。馬來西亞位於馬來半島上，土地幅員較大且完整，富含工業化所需的天然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教育環境普及但未至完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於新加坡而言是較低。因此，馬來西亞的比較優勢為：土地(land)、天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半技術勞工(semi-skilled labour)、中階技術(intermediate technology)和基本的基礎建設(basic infrastructure)。印尼是一島國，幅員廣闊但分散，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緩慢，農漁業為經濟部門的大宗，教育並不普及。因此，相對於其他二者，印尼的比較優勢為：非技術勞工(unskilled labour)、基礎技術(basic technology)、天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和未開發土地(undeveloped land)。<sup>17</sup> (參見圖五)

圖 5【馬印新成長三角的經濟互補性】



資料來源：Triangulating the Borderless World: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頁 490。

<sup>17</sup> M. Sparke & J.D. Sidaway & T.Bunnell & C. Grundy-Warr, "Triangulating the Borderless World: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9, No.4, 2004, pp.485-498.

馬印新成長三角的互存共榮並非單靠參與三方的意願，亦須周圍大環境與三方合作的基礎，才能成形發展。成長三角的發展不僅是擴大此次區域的整體經濟表現，這也影響到參與國的發展。就此成長三角而言，新加坡是整個國家都在區域內，而馬來西亞只有柔佛、印尼只有廖內涵蓋其中，因此，透過這三國對於共組成長三角的考量觀點可以了解到不同發展的國家對於同樣一個的次區域發展的反應。

## 二、 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的觀點

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最初是爲了促進工業化因而提倡進口替代，到了 1970 年代中期，開始鼓勵生產加工製造品，以利用豐富天然資源來達到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同時，藉由勞力密集的產業也在此時陸續成長，電子加工製造業佔總體製造業中的比例也逐漸增加。馬來西亞自 1995 年開始，實施一連串以五年爲一期的經濟發展計畫，而時至第七個五年計畫(The Seventh Malaysia Plan 1996 ~ 2000) 時，馬來西亞已達到 1970 年「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所宣布的重組社會與消弭貧窮這兩大目標。除此之外，在 1991 年，馬來西亞也提出「全國發展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以取代新經濟政策，除了維持新經濟政策的特點外，重要的是強調均衡發展。接著在 1996 年提出「第二工業大藍圖」(The Second Industrial Master Plan)，預計在 1996 年至 2005 年之間投入 2500 億馬幣於製造業，使製造業比重在 2005 年達 38.4%。馬來西亞與泰國及印尼合作開發馬來半島北方、與印尼及新加坡共榮馬來半島南方、與印尼、汶萊(Brunei) 及菲律賓一起開發沙巴(Sabah) 和沙勞越(Sarawak) 這兩州，從馬來西亞與周邊國家共組次區域經濟圈的策略來看，馬來西亞希望能達到國家發展均衡的目標，讓國家能吸引外來資金以充實製造業，成爲東南亞的製造業大國。<sup>18</sup>

成長三角的柔佛州不僅是馬來西亞南端與新加坡相鄰的邊境地方，並且也是馬來西亞第二大工商大城。新加坡與柔佛之間的往來關係自成立成長三角以前就十分密切，除了彼此的經濟關係之外，新加坡的供水最早且主要還是由柔佛所提供。就柔佛的地方政府而言，早在 1988 年以前就希望能與新加坡聯手發展跨境的經濟發展，其中包含產業移轉與觀光發展。而自從 1989 年成長三角被提議之後，有將近百分之兩百的資近湧進，並且資金挹注情況穩健，而這也讓柔佛的平均生產值成長率從 1989 年至 1997 年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均在 9% 以上。因此柔佛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發展成一個以出口爲導向的產業經濟，製造業每年平均成長 14%，這可以表示，從成本不等(cost disparities) 的角度來看，柔佛的生產成本略

<sup>18</sup> 雖然馬來西亞在 1996 年 5 月宣布，將在吉隆坡和新行政中心之間，總面積 750 平方公里，500 億馬幣，設立「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以吸引國內外高科技資訊及多媒體業者前來投資，目標是使馬來西亞成爲國際科技資訊業的亞太區域樞紐，類似美國的矽谷。但因人才不足的問題，至 2000 年時，外資進駐情況並不理想。參閱 杜震華與盧信昌，《世界經濟概論 — 東南亞篇》(台北：華泰書店，2001 年)，頁 202-204。

低新加坡一籌，這也使得柔佛能快速發展經濟以及與新加坡經濟一起互榮。<sup>19</sup>  
 (參見表一)

表一【柔佛與馬來西亞的基本比】

	馬來西亞			柔佛		
	1988	1989	1990	1988	1989	1990
區域面積(單位：平方公里)			329758			18914
人口(單位：百萬)		17.4	17.8			2.2
佔馬來西亞總人口之百分比						12.4
實質國內生產值(單位：百萬馬幣)	66.3	72.1	79.3	6.8	7.3	7.9
佔馬來西亞總生產值之百分比				10.2	10.1	10.0
每人年平均所得(單位：馬幣)			4432			3594
佔馬來西亞年平均所得之百分比						81.1

資料來源：Growth Triangle: The Johor-Singapore-Riau Experience，頁 50。

由上表中顯示，柔佛的經濟成長在成長三角成形時是相當不錯的。在 1980 年代，柔佛的產值約佔馬來西亞整體經濟產值的 10%；而在柔佛地方工作者的平均所得於 1990 年是 3594 元馬幣，這是相當接近當時馬來西亞國民平均所得 4432

<sup>19</sup> 杜震華與盧信昌，《世界經濟概論 — 東南亞篇》，頁 202-204。

馬幣，柔佛的經濟成長率也很接近馬來西亞總體的經濟成長率，這些顯示出柔佛是馬來西亞中相當繁榮的一個州。基於柔佛的經濟與新加坡共榮且經濟表現佳，就馬來西亞國內來說，馬來西亞的聯邦政府希望能與柔佛的地方政府共同處理經濟發展事務，因為聯邦政府不希望見到柔佛的成長拉大與其他州的發展不均或貧富差距；就雙邊關係而言，因為柔佛與廖內具有重疊的資源稟賦，因此兩者之間的往來關係並不密切，相形之下，新加坡分別與柔佛和廖內的經濟往來都很密切，所以柔佛應注意如何加深與廖內的合作關係以及增加本身的競爭力；就整個多邊亞洲經濟而言，馬來西亞可藉由此來增加本身亞洲區域內經貿的比重。<sup>20</sup>因此，馬來西亞對於成長三角的觀點，大抵上來說是參與但不積極，因為除了希望能與新加坡競爭吸引投資之外，就是放眼整體的發展均衡，避免加劇國內社會經濟的失衡，以期能成為製造業大國。

印尼自 1985 年就開始實施經濟自由化，並且採行一系列的解除管制措施，以利進出口及投資。而於 1992 年開放鋼鐵產品進口、進一步放寬外人投資項目，並且允許外資企業得持有土地開發權。印尼在第六期的五年計畫(1994-1999)推動目標係以基礎建設及人力資源為優先發展項目，並增設經貿機構、簡化行政規定以改善官僚系統，同時要吸引外資和私營企業來共同促進經濟發展，印尼政府除以政策方向導引，及給予申辦手續之方便外，並採低關稅鼓勵投資人，鑑於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需求，印尼雖然鼓勵高科技、高附加價值及出口導向產業之發展，但也扶植具有天然資源優勢及重點特色之民族工業和中小企業，以期經濟穩定成長與社會安定。雖然採行一系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自由化政策，但因受亞洲金融風暴所累，印尼政府為因應印尼盾大幅貶值，而於 1997 年緊急採取若干措施，包括取消外國人對上市公司之投資最高為 49% 的規定、與國際貨幣基金(IMF) 達成貸款協議，重整金融部門、改革財政和貨幣政策，並以近一不自由化的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雖然印尼經濟在 1999 年時有開始向上爬升中，但由於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印尼的社會經濟產生大大的動盪，而讓貧富不均的問題持續惡化。<sup>21</sup>因此，一般而言，整體的印尼經濟是相當需要外資的投入以增加就業率，進而改善社會經濟情況。

廖內群島加入馬印新成長三角對整體的印尼經濟是有助益的，而其中的巴譚島(Batam island) 及賓坦島(Bintan island) 均個別設置工業園區，這也是有助於印尼吸引外資。對印尼而言，參加成長三角的經濟效益比政治效益來的大，因為印尼認為，新加坡並不具威脅性，不管在國際政治層面上以及在國際經濟層面上。新加坡與廖內的往來關係也是早在成長三角成形之前就已存在，只是於 1990 年 8 月，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 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 在巴

<sup>20</sup> Yuhanis Kamil & mari Pangestu & Christina Fredericks, "A Malaysian Perspective," in Lee Tsao Yuan, ed., *Growth Triangle: The Johor-Singapore-Riau Experience* (Singapore: ISEAS, 1991), pp. 37-74.

<sup>21</sup> 印尼為全球第五大債務國，每年都需向國際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借貸，所以，印尼的外債額曾經至少為 1445 億美元。參閱 杜震華與盧信昌，《世界經濟概論 — 東南亞篇》，頁 135-147。

譚島會面並簽署協定後，在成長三角的基礎框架上，新加坡與印尼的聯合發展計畫以及之間的經濟合作就此蓬勃展開。這樣的新加坡與廖內之間的經濟合作協定 (Singapore-Riau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不僅逐漸將巴譚島的特別出口區的影響範圍藉由成長三角來擴散至整個廖內省，而且也吸引私人企業進駐廖內省，進而開發境內的有用資源，漸漸地繁榮廖內地區。最重要的是，這經濟合作協定降低投資者所可能面臨的障礙，以及兩國聯合參與基礎建設的發展和區域的推廣行銷。嚴格來說，印尼與新加坡透過成長三角機制下的合作，對於印尼而言，確實還是可分成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的利益；政治面上，藉著經濟事務方面的來往，兩方增加政治精英的交流與政治面的穩定，印尼方面可以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在維護麻六甲海峽與新加坡海峽這一帶海域的安全上合作，同時也間接地穩定印尼在廖內省的邊境安全，減少政治上的干擾；經濟面上，新加坡與印尼基於各自的經濟互補而創造雙贏的局面，因為新加坡的投資者佔投資廖內省的投資者總額的 40%，這也顯示，印尼已成爲新加坡產業的後花園，廖內的開發將持續不斷，同時兩國對成長三角經濟發展的政策及協定是降低投資者心中的不確定感以及幫助廖內吸收更多海外資金。因此，最初印尼加入成長三角的想法是，整個廖內群島，除了巴譚工業區之外，是處於未開發的情況，同時，廖內省的地方政府也無充足的資金可供開發之用，若能將出自雅加達的些許資金聯合那些來自新加坡以及別的國家所挹注的資金，則位於印尼北方邊界的省份的經濟就能順勢發展起來。而依據印尼產業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 的發現，廖內的經濟發展，直接地創造 150000 份工作職缺、每年平均賺取外匯約爲一至二兆美元以及產業發展的擴展與深化。<sup>22</sup>由此可見，工業園區對於廖內省的發展是不可忽視的。

(參見表二)

<sup>22</sup> Shannon L.D. Smith,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qu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1, No.3, 1997, pp.369-382.

表二【印尼與新加坡的聯合計畫】

Project	Value
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	350
Batanindo Executive Village	60
Bintan Beach International Resort	2000
Bintan Industrial Estate	350
Bintan Island Water Project	950
Karimun Industrial Estate	600
Karimun Marine Complex	1000
Sumatra Water Project	5000

資料來源：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quation，頁 375。 附注：計畫價值的單位是百萬美元。

不管是巴譚工業園區(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 還是賓坦工業區(Bintan Industrial Estate)都是為印尼經濟加值的計畫。而其中的巴譚工業園區是最早設立在廖內地區且是由印尼政府敲定的，再者，也是導致印尼與新加坡雙方由密切的經濟關係生升級到共同加入成長三角的一大要因。巴譚島被設計成經濟特區的特質有三，首先，用於加工或再加工之貨物及原料，可免徵關稅及增值稅。其次，自巴譚島出口產品至印尼其他地區，視為進口品需課徵進口關稅。最後，自印尼其他地區輸往巴譚之貨品免徵出口關稅，亦不受出口規則限制。而在巴譚島投資的廠商亦適用印尼的外人投資法，但比其他地區受到的限制少。以自有資本比率而言，原本印尼政府規定外人資本持有比率不得超過百 80%，在巴譚島設廠的廠商 若其全部產品用於出口時，前五年可享受百分之百的股權，五年後則需減少至 95%，亦即移轉百分之五的股權給當地的印尼人民，其他的優惠措施尚有，外人有全權的管理權、外資公司免受國有化之衝擊、加速投資申請之審查程序及簡化貨品進出關手續。除了軟性的政策法令面的支持之外，基礎建設也是有利於設廠，島上設立八個工業園區，接由新加坡與印尼政府合作設立，各個園區之間有道路連接，並且巴譚島設立港口，可供船運，並有一個機場，功能也是與時俱進，而電力及電信也是由雙邊政府攜手推展。<sup>23</sup>因此，鑒於印尼對於開發廖內省所做的相關政策及基礎建設的支持，可以顯示出印尼對於成長三角是持贊成的態度，並且樂意見到廖內省與新加坡互利共榮，進而為印尼的經濟社會帶來一定的助

<sup>23</sup> 劉圻 譯，〈成長三角計畫與巴譚島投資概況介紹〉(Growth Triangle 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in Batam Island)，《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4 卷第 11 期，1991 年 11 月，頁 99-102。

益。

新加坡於 1965 年的全國生產毛額是九億七千萬美元，但到了 1990 年時已達三百四十五億美元。若平攤購買力是全世界第九位。新加坡爲了經濟發展而提供優惠稅率、財政誘因等的自由經濟政策來吸引外資投資，除此之外，也積極培養各類的高階專業人才以讓投資外商可以立即得到所需的專才，不須花更多的人力成本從其他地方僱請專業人才。這些經濟發展的歷程與成果加速新加坡從第三世界跳入第一世界；正因爲世界的運作就是靠相互交換和藉引進新科技改善生產力，<sup>24</sup>新加坡得以在挹注財源支持各個有利經濟發展的新計畫的同時，不僅吸收外國的資金與新科學技術，又可藉由投資外國及輸出技術而獲得經濟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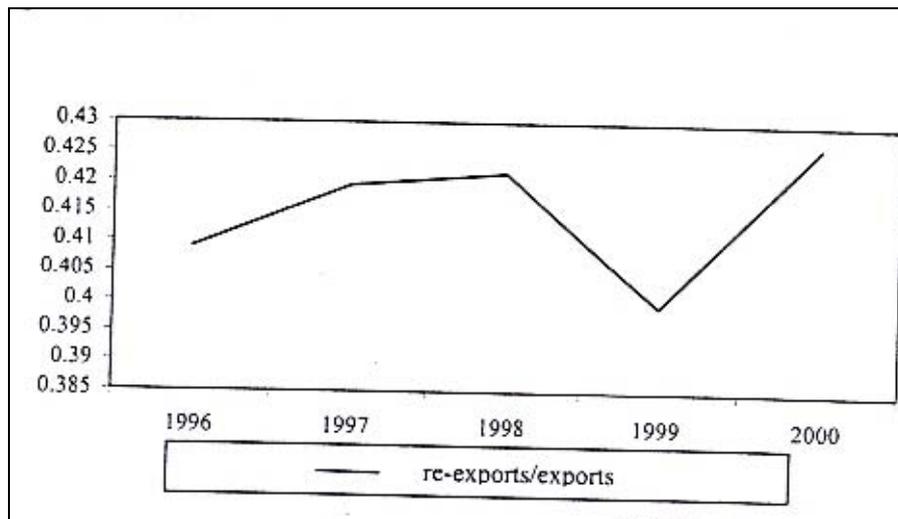
在馬印新成長三角中，新加坡是扮演輸出資金與人才的角色，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新加坡經濟發展程度可視爲從第三世界晉身爲第一世界的行伍，新加坡也是個天然資源缺乏的城市國家，爲了本身的生存發展，早在英國殖民期間就開始進行工業化，並且朝向國際化發展。隨著世界經濟發展潮流，新加坡逐漸將傳統低附加價值的產業移轉至他處，而充分利用本身有限的土地及高階技術的人力來進行高附加價值產業，例如，電子、生技及石化…等。因此，鄰近新加坡的柔佛與廖內自然是勞力與土地密集產業移轉地之首選，新加坡本身則朝向知識經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 邁進，<sup>25</sup>在這種經濟策略驅動下，新加坡透過與柔佛及廖內合作使所位於的次區域成爲一完整發展產業群聚的基本腹地，在這產業群聚中，新加坡利用本身的轉運港貿易 (entrepot trade)、有利於經貿的政策與高階專業人才以保維持本身經濟的競爭力。<sup>26</sup> (參見圖六、表三)

<sup>24</sup> 韓福光、陳澄子、華仁 (Warren Fernandez) 著，張定綺 譯，《李光耀治國之鑰》(Lee Kuan Yew: the man and his ideas) (台北：天下遠見，1999)，頁 110-127。

<sup>25</sup> Linda Low,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s Policy on Foreign Talent and High Skills," *Journal of Education & Work*, Vol.15, Issue.4 (Dec.2002), pp.409-425.

<sup>26</sup> Sven W. Arndt, "Production sharing and Singapore'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Ramkishan S. Rajan, ed., *Sustain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pp. 91-101.

圖六【新加坡的再出口與出口比】



資料來源：Sustain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頁 92。

表三【新加坡產業專業化指數】

Product type	Rank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nsumer electronics	4	2.61
Electronic components	5	3.00
Misc. manufacturing	25	0.94
Non-electric machinery	34	0.58
Chemicals	56	0.68
Transport equipment	58	0.13
Minerals	81	0.86
Clothing	94	0.41
Textiles	99	0.25
Basic manufacturing	102	0.30
Wood products	112	0.16
Processed food	117	0.41
Fresh food	156	0.25

資料來源：Sustain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頁 97。

新加坡在轉運港貿易方面一直是東南亞區域最具競爭力的，而其轉運的項目中，比重日增的再出口(re-export) 項目中就有包括從柔佛或廖內而來的成品或那些還欠缺最後關鍵加工的半成品，這也顯示出，藉由跨國界的生產是產業競爭力得根源，而新加坡的產業利用這個特性，透過成長三角達到產業的規模經濟效益，這不僅增加新加坡經濟的生產力，並且也促使新加坡本身的產業轉型，以利

知識經濟的發展。相對於歐洲或美洲，新加坡的專業人力的成本算是較低，並且新加坡本身的專業化產業的能力也是相當卓越的，這些都是造就新加坡擁有良好商業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基於優勢產業與人力成本，，不管從全球經濟的角度或亞洲經濟的視點而言，新加坡藉由週邊產業群聚發展良好的成長三角而更顯得具有競爭力。(參見表四)

表四【亞太區域中最適商業環境評比】

經濟體	1999 年—2003 年排名	2004 年—2008 年排名
新加坡	2	1
香港	1	2
紐西蘭	3	3
澳洲	4	4
台灣	5	5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Forecast, October/2003.

## 肆、新加坡的次區域發展策略

次區域發展的平台不只單存地意指發展的範圍不若區域之廣，更點出一經濟體在面對複雜難控的政經環境時，次區域發展策略的施行對於國家政經發展也是有助益的。

### 一、次區域的討論

「次區域」，顧名思義，就是比區域為小，但比小區域為大的一個範圍，而區域就如同泛指所謂的亞洲或歐洲等，小區域則通常意指一個地方或一個面積較小的國家，就如同馬來西亞的柔佛州或城市型國家的新加坡，次區域有可能包含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家，但一般來說，次區域大約包含數個國家的某一地方以及面積的小型國家。因此，就具體來說，次區域可以如同馬印新成長三角般地包括柔佛州、新加坡與廖內省。

這類跨國境的次區域發展可以視作邊境整合。透過邊境整合(borderland integration) 而使得經濟的擴溢效應漸次地散播開來，而這擴溢效應也會傳散到不同的功能領域。從亞洲的發展歷程來看，國境整合的浮現代表著相鄰的國家之間的威脅日漸消失並且國家之間對於安全有著一定的共識基礎。而國境整合的產

生也不是一蹴可幾的，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時，生產模式的全球化加速全球資金從第一世界轉至第三世界，亞洲新興工業國的快速成長與其國內生產成本的逐漸提高，這些無形中均替東協國家的增加競爭力，因此，由此發展歷程可知，世界經濟的發展由早期的資金自中心(core) 國家流往半邊垂(semi-periphery) 國家，而現今的資金也有自半邊垂國家前進邊垂(periphery) 國家的情形發生；而資金由半邊垂國家流入邊垂國家所衍生的經濟發展即屬所謂的邊境經濟整合(borderl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的經濟發展。<sup>27</sup>馬印新成長三角主要涵蓋的範圍極為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三國的交界的週邊區域，因此，此成長三角的發展也顯示出，一個邊境經濟整合的經濟發展需要有彼此互補，而新加坡不僅與另外兩者互有經濟互補之外，並且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於其他二者是較高的，新加坡維持本身在其中的經濟序列位置與比重可藉由新加坡面對複雜多變的亞洲政經情勢來觀察。

## 二、次區域的發展利基

對外貿易是亞洲各經濟體重要的發展階段，因為貿易可以帶動製造業的繁榮以及吸引外資的投入，所以，身為一投資貿易圈的次區域的發展端視整體世界經貿體系的形式和區域本身的經貿情勢方能標誌出次區域的發展利基。

亞洲在二次大戰之後，以及共產主義勢微之後，亞洲地區內的各經濟體無不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奮力向前進，工業化讓各經濟體國內的製造業的訂單大部分是來自歐美國家，不管是日本還是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都是依賴外銷歐美國家的貿易而蓄積經濟發展的能量；而隨著經濟發展落差與亞洲整體經濟蓬勃發展，區域內貿易(intra-regional trade) 逐漸形成亞洲各經濟體的主力戰場，不管是以前的日本還是現今的東協與中國大陸，區域內貿易自 1965 年至 1995 年間的三十年中佔整體亞洲貿易量的比重從百分之三十二接近到百分之五十，<sup>28</sup>亞洲區域內的貿易成長不僅帶動亞洲的經濟體成長，同時也吸引到來自歐洲與美洲的注意與競逐。

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兩區域貿易體的成立，對會員國而言是加分效果，但是對於亞洲各經濟體來說，卻是減少對歐美輸出利益的利剪，因為非會歐盟會員國的亞洲經濟體並無享受到貿易關稅上的優惠。雖然亞洲各國都有共識來讓亞洲像歐盟般地有機制地組織運作，但是亞洲地區內的各國在政治上、文化上、地理上與歷史上的發展型態與歐洲的不一樣，因此，亞洲能有向歐盟一樣機制般的組織，仍然需要克服一些非經濟上的問題。<sup>29</sup>

<sup>27</sup> K.C. Ho & Alvin So, "Semi-periphery and borderland integrati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experience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6, No.3, 1997, pp.241-259.

<sup>28</sup> Jessie P.H. Poon & Edmund R. Thompson, "Asia Pacific and European Patterns of Intra- and Extra-regional Trade," in David E. Andersson & Jessie P. H. Poon, eds., *Asia-Pacific Trans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 2001), pp.189 -206.

<sup>29</sup> Richard Higgot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the Asia-Pacific and Europe

東南亞是個多種族與多文化的地區，再加上歷史上難解的問題，彼此間政治上的衝突…等，新加坡位於此區域，所以了解到，與周邊國家有著良好的互動會對本身的帶來幫助，特別是能在無國家安全的威脅顧慮下所進行的經濟發展是非常具有活力和穩健的步伐。

綜上所述，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本身的區域貿易，以及新加坡本身的競爭力，都是新加坡發起馬印新成長三角的基本考量點，因此，次區域在亞洲的發展利基亦即源於此，經貿集團化的影響、區域內貿易增加以及持續競爭力。

### 三、新加坡的次區域發展策略

新加坡藉由與柔佛和廖內合作以建立互利共榮的馬印新成長三角，彼此憑藉著本身的比較優勢來增進彼此的經濟發展以及穩健彼此間的關係發展。這樣的策略對新加坡發展歷程而言是不可忽略的，因為新加坡憑藉的就是本身的經濟競爭力與有利於國家永續發展的對外關係。因此，本文認為，新加坡透過馬印新成長三角中的合作關係來兼俱穩定與鄰國的關係以及吸引更多外來投資之目的；再者，新加坡處在這複雜的國際政經體系下，可藉由次區域合作以利本身在亞洲經濟的定位；最後，新加坡預期在未來的亞洲整體經貿發展中可以憑藉成長三角所累積的亞洲政經位置而持續國家發展和力保本身的國家競爭力。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專書

王佳煌，1998。《國家發展》。臺北：台灣書店。

杜震華與盧信昌，2001。《世界經濟概論 — 東南亞篇》。台北：華泰書店。

柯新治，2003。《新新加坡：南海之珠的經濟與社會新動向》。臺北：天下遠見。

#### 譯著

Philip Kotler 和 Hermawan Kartajaya 著，劉世平 譯，2001。《亞洲新未來：建立永續發展的經濟體》(*Repositioning Asia: From Bubble to Sustainable Economy*)。臺北：商周出版。

韓福光、陳澄子、華仁(Warren Fernandez) 著，張定綺 譯，1999。《李光耀治國之鑰》(Lee Kuan Yew : the man and his ideas)。臺北：天下遠見。

#### 期刊論文

辛翠玲、吳重禮，2002/6。〈從合作到整合：論歐洲政治合作的發展〉，《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0 卷第 1 期，頁 25-51。

吳榮義，1998/3。〈亞洲次區域成長區雙贏的啓示 — 談台灣與沖繩經濟合作關係〉，《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1 卷第 3 期，頁 104-110。

劉忻 譯，1991/11。〈成長三角計畫與巴潭島投資概況介紹〉(Growth Triangle and Investment Development in Batam Island)，《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4 卷第 11 期，頁 99-102。

### 英文部分

#### 專書論文

Chia Siow Yue & Jamus Jerome Lim, , 2003. "Singapore: A Regional Hub in ICT," in Seiichi Masuyama & Donna Vandenbrink, eds.,

-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east asia's changing industrial geography*. Singapore: ISEAS and NRI. pp. 259-273.
- Donald E. Weatherbee, 1995. "Southeast Asia at Mid-Decade: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 i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3-27.
- Edward K. Y. Chen & C. H. Kwan, 1997.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in Asia," in Edward K. Y. Chen & C. H. Kwan, eds., *Asia's Borderless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Subregional Zone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pp. 1-27.
- Fu-Kuo Liu, 1996.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etus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Pacific Asia," in Ian G. Cook & Marcus A. Doel & Rex Li, eds., *Fragmented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in Pacific Asia*. Brookfield: Ashgate Publishing. pp. 137-166.
- G. Naidu, 1998. "Johor-Singapore-Riau Growth Triangl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Myo Thant & Min Tang & Hiroshi Kakazu, eds., *Growth Triangles in Asia: A New Approach to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55.
- Jessie P.H. Poon & Edmund R. Thompson, 2001. "Asia Pacific and European Patterns of Intra- and Extra-regional Trade," in David E. Andersson & Jessie P. H. Poon, eds., *Asia-Pacific Trans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 pp. 189 -206.
- Macleod, Scott & T.G. McGee., 1996. "The Singapore-Johor-Riau Growth Triangle: An Emerging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in Fu. Chen Lo & Yue-man Yeung, eds., *Emerging World Cities in Pacific Asi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pp. 417-464.
- Minghi, J. V., 1991 . "From conflict to harmony in border landscapes," in D.Rumley & J. V. Mingley, eds., *The geography of border Landscapes*. London: Routledge. pp. 15-26.
- Richard Higgott, 1998.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the Asia-Pacific and Europe compared," in William D. Coleman and Geoffrey R.D. Underhill, eds.,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New York: Routledge pp. 42 -67.
- Sven W. Arndt, 2003. "Production sharing and Singapore'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Ramkishan S.. Rajan, ed., *Sustain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91-101.

Yuhanis Kamil & mari Pangestu & Christina Fredericks, , 1991. “A Malaysian Perspective,” in Lee Tsao Yuan, ed., *Growth Triangle: The Johor-Singapore-Riau Experience*. Singapore: ISEAS. pp. 37-74.

### 期刊論文

Dajin Peng, Winter, 2002/2003.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7, No.4 , pp.613-641.

K.C. Ho & Alvin So, 1997. “Semi-periphery and borderland integratio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experience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6, No.3, pp.241-259.

Linda Low, Dec.2002. “Globalis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s Policy on Foreign Talent and High Skills,” *Journal of Education & Work*, Vol.15, Issue.4, pp.409-425.

M. Sparke & J.D. Sidaway & T.Bunnell & C. Grundy-Warr, 2004. “Triangulating the Borderless World: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9, No.4, pp.485-498.

Shannon L.D. Smith, 1997.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qu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1, No.3 , pp. 369-382.

Waldron, Darryl G., Spring, 1997. “Growth Triangles: A Strategic Assessment,”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5, No.1, pp. 53-67.

### 研究報告

Min Tang and Myo Thant, February, 1994 . Growth Triangl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Operational Problem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ctober, 2003. EIU Country Forecast,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conomicist*.

# Singapore's Sub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MIS-GT

**Chia-Chen Hsieh**

(Postgraduate at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growth triangle is a unique Asian economy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reasons of Singapore to proposed the formation of growth triangle is for its benefit confronting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responses to the Asian political-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ason of Malaysia to participate the growth triangle is for equality of north and south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in the Southeast-Asia, while Indonesia want to flourish the econom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estate. Generally, Singapore locates in the southeast-asia region, where contains multi-culture and multi-political-economic environment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profit from each other and to keep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niche.

**Key Word:** Malaysia-Indone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donesia, Malaysia